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晋演义/蔡东藩著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7.1

(中国历代通俗演义)

ISBN 978-7-5080-4094-3

I. 两… II. 蔡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8500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1/32 开本 22.75 印张 689 千字 2 插页

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4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总 序

杨天石

历史是既往的人类生活。人们渴望了解历史,了解本身所属国家、民族、社会的过去,总结成败经验,吸取智慧,于是,历史著作应运而生。历史著作以真实地记录历史过程、历史人物为目的,一般比较枯燥,趣味性差。为了克服这一毛病,于是,就有了创作历史文艺的需要。历史文艺虽以历史上发生过的某些情节为依据,但可以虚构、想像,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挥洒的空间,自然,作品就远较历史著作生动、有趣。人们熟知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。前者至今仍是人们认识那段时期的权威著作,但它大抵只是少数历史学家的案头读物;后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,长期流传不衰,但它并不是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。鲁迅曾说:“我们讲到曹操,很容易就联想起《三国演义》,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,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。”近年来,影视界流行“戏说”,有几位皇帝、后妃及若干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灵活现,收视率很高,说明老百姓爱看,但是,由于大异于历史记载,更大异于历史真相,不满者似乎也很不少。可见,真实性和趣味性历来是历史著作和历史文艺的两难问题。要严格忠实于历史,作品就很难生动;要提高生动性、趣味性,就必须虚构,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历史的真实。蔡东藩先生的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总结前人经验,试图解决这一矛盾,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实性,又有趣味性,在中国丰富繁多的演义作品中,是很具特色的一部。

蔡东藩(1877—1945),浙江萧山人。1890年(光绪十六年)考中秀才。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,分发福建,以知县候补,因不满官场恶习,于1911年称病归里。其后长期以写作和在小学教书为生。抗日战争爆发,他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,辗转避难,颠沛流离,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。

清朝末年,严复、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说的巨大社会教化作用,企图

借小说宣传变法维新思想；戊戌政变后，梁启超流亡海外，创办《新小说》杂志，提倡“小说界革命”。自此，小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，包括“历史演义”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。民国时期，此风相沿，小说创作日趋繁荣。蔡东藩是个爱国者。他为武昌起义、共和初建兴奋过，欢呼过，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。蔡东藩幽愤时事，立志“借说部体裁，演历史故事”，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。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间，他夜以继日，笔耕不辍，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，1040回，以小说形式再现了上起秦始皇，下迄民国的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，加上另撰的《西太后演义》和他增补改写的《二十四史通俗演义》，总计约七百余万字，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演义作家。出版以后，迅速风行，多次再版。

蔡东藩的作品用章回体，取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；用白话，取其浅显易懂。这些，他和明清以来的“演义”作家并无区别。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。蔡东藩自幼爱好历史，熟读传统的经、史、子集各类书籍，对中国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，甚至养成了“考据癖”。他写历史演义，“语皆有本”，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；对于文献中的歧说和模糊不清之处，他常常博览群书，多方钩稽，力求找出客观真相；一时难以做出结论的，他就诸说并存；对他认定的史籍中的错误说法，就直接加以批驳。可以说，他是在用研究历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写“演义”。对于前人所写同类作品，蔡东藩颇多批评，或认为荒诞不经，或认为乖离史实，子虚乌有。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，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；以逸闻为纬，不尚虚诬”。自然，作为“演义”，他也有虚构，特别是人物对话，史无记载，他不能不动用自己的想象力，但是，他很谨慎，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，不敢任意编造。因此，他的书，可以当作历史读。倘若读者要大体，而不是精确地了解中国历朝历代的大事经纬与主要人物，蔡东藩的书是值得一读的。1937年1月，毛泽东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，曾致电李克农，要他购买“中国历史演义”两部。这里所说的“中国历史演义”，就是蔡东藩所著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。毛泽东卧室床侧，就放有蔡氏此书。由此不难看出，毛泽东对蔡著的喜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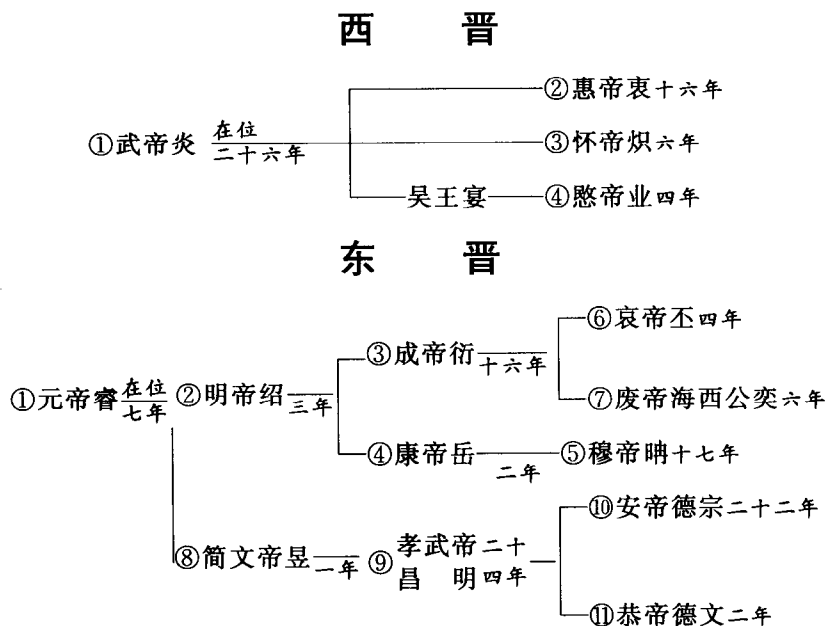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历史学家有史德、史识、史才之说。所谓史德，指的是忠于历

史，忠于史实，能在任何状况下“秉笔直书”；所谓史识，指的是对历史判断方面的真知灼见；所谓史才，指的是掌握、剪裁史料以及叙事、表达能力。在这三方面，蔡东藩都颇多可取之处。据记载，当他写《民国通俗演义》时，曾有军人以请他吃“红丸子”（子弹）相威胁，书局因此要他“隐恶扬善”，他断然拒绝，声称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为惩罚乱臣贼子。我写的都有材料根据，要我捏造，我干不来！”自此愤然辍笔，以致书局不得不另请许廑父，将该书的后四十回续完。蔡东藩不屈于强权，宁可不写，决不伪造历史，表现出历史家的可贵操守。他的书，努力寻求历代兴亡“关键”，劝善惩恶，褒是斥非，洋溢着鲜明的历史正义感和爱国主义、民主主义精神。读蔡著，既可轻松地获得历史知识，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启迪。当然，蔡著中也有一些陈腐观念，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，在所难免。这一点，相信读者当能了解并鉴别。

2003年12月15日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

两晋世系图

按晋武帝为司马懿孙，元帝则为司马懿曾孙，祖伯父觐，皆为琅玕王。相传觐妃夏后氏与小吏牛金通而生元帝，故有牛代马后之谣，特附录之。



上西晋传三世，凡四主，计五十二年。东晋传四世，凡十一主，计一百零四年，两共计一百五十六年。《晋书》载西晋五十四年，东晋一百零二年，此为怀愍失国后之二年，晋廷无主，仍用怀愍年号，今读史家言，谓宜并入东晋，颇有至理，故从之。）

自序

《晋书》百三十卷，相传为唐臣房乔等所撰，盖采集晋朝十有八家之制作，及魏崔鸿所著之《十六国春秋》等书，会而通之，以成此书。独宣武二帝纪，与陆机王羲之传论，出自唐太宗手笔，故概以御撰称之，义在尊王，无足怪也。后书评论《晋书》之得失，不一而足，而《涑水通鉴》《紫阳纲目》叙述晋事，书法与《晋书》相出入者，亦不胜举焉。愚谓当今之时，以古为鉴，不必问其史笔之得失，但当察其史事之变迁。两晋之史事繁矣，即此内讧外侮之复杂，已更仆难详。宫闱之祸，启自武元，藩王之祸，肇自汝南，胡虏之祸，发自元海；卒致铜驼荆棘，蒿目苍凉，螯坠三山，鲸吞九服，君主受青衣之辱，后妃遭赭寇之污，此西晋内讧外侮之大较也。王敦也，苏峻也，陈敏杜弢祖约也，孙恩卢循徐道复也，而桓玄则为篡逆之尤，此东晋内讧之最大者。二赵也，三秦也，四燕五凉也，成夏也，而拓跋魏则为强胡之首，此为东晋外侮之最甚者。盖观于东西两晋之一百五十六年中，除晋武开国二十余年外，无在非祸乱侵寻之日，不有内讧，即有外侮，甚矣哉！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。夫内政失修，则内讧必起，内讧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，木朽虫生，墙罅蚁入，自古皆然，晋特其较著耳。鄙人愧非论史才，但据历代之事实，编为演义，自南北朝以迄民国，不下十数册，大旨在即古证今，惩恶劝善，而于《两晋演义》之著手，则于内讧外侮之所由始，尤三致意焉。盖今日之大患，不在外而在内，内讧迭起而未艾，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，不特两晋为然，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。天下宁有蚌鹬相争，而不授渔人之利乎？若夫辨忠奸，别贞淫，抉明昧，核是非，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，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，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。惟书成仓猝，不免诋误，匡我未逮，是所望于阅者诸君。中华民国十三年夏正季秋之月，古越蔡东藩自叙于临江寄庐。